

唐宋八大家文集

韩愈文

郭预衡 主编

詩歌窈窕之章
少焉月出於東山
之上徘徊於斗牛
之間白露橫江水

唐宋八大家文集

郭预衡 主编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44416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唐宋八大家文集/郭预衡主编. -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1997.3

ISBN 7-80002-830-5

I. 唐… II. 郭… III. ①古典散文-中国-唐代-选集
②古典散文-中国-宋代-选集 IV. I26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1656 号

书 名: 唐宋八大家文集

主 编: 郭预衡

责任编辑: 柯愈春

曼叶平

封面设计: 王 华

出 版 者: 人民日报出版社 (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/邮编: 100733)

发 行 者: 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河北遵化印刷厂

字 数: 3056 千字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27.125

印 数: 6000

印 次: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002-830-5/G·248

定 价: (全十册) 191 元

总 序

唐宋古文，不仅八家，而八家之文，流传最广。这固然和茅坤所编《八大家文钞》有关，但也因为八家之文确有特点。

这里首先谈谈八家之文的共同特点。

其一，八家之文，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章敢于直言、敢说真话的传统。

先秦之文，放言无惮；魏晋之文，师心使气；唐初之文，直言极谏。八家之文，大抵都讲真话，遇事敢言。例如韩愈的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和《论佛骨表》，都是在“群臣之所未言”，或“群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举其失”的情况下，冒着得罪的风险上奏的。《论佛骨表》中所谓历代帝王奉佛者，“乱亡相继，运祚不长”，“事佛渐谨，年代尤促”，“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祸”云云，都是“发言真率，无所畏避”（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）的。又如欧阳修的《与高司谏书》，为范仲淹等被贬而辩护；写《朋党论》，反驳朝廷的决策。其中竟说自古以来，凡是“禁绝善人为朋”的君主，如商纣王、汉献帝、唐昭宗等，“皆乱亡其国”，都是亡国之君。对于当朝天子敢说这话，也

16. 2. 6. 1

是敢冒风险的。柳宗元敢讲真话的文章有《贞符》、《封建论》、《非国语》等，《贞符》反驳神学迷信，说“受命不于天，于其人；休符不于祥，于其仁。”列举唐之“十圣”，而不及当代之君。这是当朝天子很难容忍的。苏轼撰《志林》，讲“秦废封建”，赞同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，说“封建者，争之端而乱之始”，“自书契以来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父子兄弟相残杀”，“无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。”如此为文，也是颇大胆的。

其二，八家之文，也都比较能够抒发真情实感。继承了古代文章发愤著书、直抒胸臆的传统特点。

韩愈的《祭十二郎文》固然洋溢着家人父子之情，其《柳子厚墓志铭》谓“士穷乃见节义”一段，对于柳宗元被谪而死，不胜其愤，也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。柳宗元的《祭吕衡州温文》，对于吕温之死，更为怨愤。他说：“君子何厉，天实仇之；生人何罪，天实讎之！聪明正直，行为君子，天则必速其死；道德仁义，志存生人，天则必夭其身。吾固知苍苍之无信，莫莫之无神。”这是因人世之不平，责上天之不公，殆与司马迁的《伯夷列传》同一观感。柳宗元还有《哭张厚余词》一文，其中讲“天之杀恒在善人而祐不肖”，亦与此文同调。欧阳修的抒情之文，不仅有《泷冈阡表》这类作品，所撰《新五代史》的一些传赞，也常流露自己的感叹。李涂《文章精义》卷五十一云：“欧阳永叔《五代史》赞首，必有‘呜呼’二字，固是事变可叹，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。”在司马迁

的《史记》之后，于史书论赞中时发感慨，是《新五代史》独有的特点。苏轼行文，感慨亦多。其父子、兄弟、朋友之情，尤为深厚，一些书信杂文，无不一往情深。有的文章，虽然不似抒情，其情亦不可掩。例如《筧簞谷偃竹记》一文，开始讲述文与可的一段“成竹在胸”的画论，而后写他和与可的诗画往还，与可“发函得诗，失笑，喷饭满案”。写到这里，都是平居欢笑之语，并无哀悼之意。直到最后，才说：“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，与可没于陈州；是岁七月七日，予在湖州曝书画，见此竹，废卷而哭失声。”至此乃知，这篇文章，不同一般的画记，实是悼念友人与可的。

其三，八家之文，也善于遣词造句，凝炼自然，极见功力，这一点也发扬了中国古人讲究“辞令”、重视“修辞”的传统。

例如韩愈为文，虽然有时“尚奇”，间有“佶屈聱牙”之语，但其总的倾向，是要做到“文从字顺”的。不仅文从字顺，而且十分凝炼。突出之例，是《进学解》一文。在这一篇之中，就有“业精于勤”、“刮垢磨光”、“贪多务得”、“含英咀华”、“佶屈聱牙”、“同工异曲”、“动辄得咎”、“俱收并蓄”、“投闲置散”等等凝炼之句，且已成为习用的成语。还有“提要钩玄”、“焚膏继晷”、“闾中肆外”、“啼饥号寒”等等成语，也是从这一篇里面提炼出来的。自古以来，一篇文章之中能够提出如此众多的成语，此文之外，实不多见。欧阳修为文，主张“自然”，尤其

讲究“平易”。反对“为新奇以自异”（《跋唐韦维善政论》）。为文做到“平易”，也是得自功力的。周必大跋《居士集》称：“前辈尝言公作文，揭之壁间，朝夕改定。今观手写《秋声赋》，凡数本，《刘原父手帖》，亦至再三，而用字往往不同。”还有《醉翁亭记》一文，据《朱子语类》说：“顷有人买得他《醉翁亭记》稿，初说滁州四面有山，凡数十字，末后改定，只曰‘环滁皆山也’五字而已。”凡此，皆可说明，欧阳修行文用语之平易，是下过很多功力的。苏轼之文，不仅平易自然，而且自由随便，似乎不假功力。王世贞就曾说过：“读子瞻文，见才矣，然似不读书者。”（《艺苑卮言》）但其实，苏轼不仅读书，而且“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。”（《又答王庠书》）他的文章同样也是得自功力的。

以上这些特点，在八家之文中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。若就每一作家而言，其为人和为文，又自有其个人的特点。

首先是韩愈的为人和为文。

韩愈在历史上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。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，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。”（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）前代评点古文者，或谓这四句“说尽韩公一生”。但朱熹的看法，有所不同，他说韩愈“每日工夫，只是作诗、博弈、酣饮，取乐而已。”“至其作官临政，也不是要为国做事，也无甚可称，其实只是要做官而已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三十九）

今天看来，苏轼扬之过高，而朱熹抑之太甚，韩愈为人，未可一概而论。以做官而言，并非“无甚可称”，例如他初为监察御史，遇到灾荒，曾立即上疏，讲“天旱人饥”，为民请命，因此而被贬官，此即“可称”的一点。又如宪宗皇帝迎接佛骨，韩愈又上《论佛骨表》，因此再次遭贬，这又是“可称”的一点。此外还有奉命宣抚王庭湊，“众皆危之”，元稹且谓“韩愈可惜”，而韩愈无所畏惧。这也说明，韩愈为人，并非“只是要做官而已。”当然，韩愈一生，是比较积极谋官的。未得官时，给宰相上书，一月之内，多达三次。贬官潮州之时，又立即上书皇帝，谋官甚力。这些也是不可讳言的。但韩愈为人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，是他不仅谋求自己做官，也曾同样尽力为他人谋官。他曾建议朝廷广开仕途，为广大的文人士子谋求出路。他写的许多文章都体现着这一思想特点，都是主张广开才路。例如《进学解》一文，一方面是自己才高位下而发牢骚，另一方面则是为朝廷不重人才而发议论。其中所谓“拔去凶邪，登崇峻良”，“占小善者率以录，名一艺者无不庸”云云，虽是故作反语，却也是正面的主张。此外《原毁》一文也讲任用人才不可责备求全，应该“取其一，不责其二；即其新，不究其旧。”《讳辩》一文，为李贺因避父讳“不举进士”而申辩；《送杨少尹序》，为杨巨源致仕，才不尽其用，亦颇为不平。《论孔戣致仕状》，更明确地指出，孔戣上书致仕，天子应“殷勤留止”而“不听其去”，听其致仕，人才可惜。还有，一向被人看作游戏之文的《毛颖传》，实质上也是假借寓言而发泄对于人

才不尽其用的感叹。此文称赞毛颖有博古通今之才，曾为秦皇尽心效力，但到最后，却“赏不酬劳，以老见疏”。韩愈感叹：“秦真寡恩哉！”显然是有激之言。

其次是柳宗元的为人和为文。

柳宗元和韩愈两人同被后世称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，其实，当时并无所谓“古文运动”。韩愈固曾招收后学，倡言古道和古文，而柳宗元却未尝如此。他在《答吴武陵论〈非国语〉书》中说：“仆之为文久矣，然心少之，不务也，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，故在长安时，不以是取名誉，意欲施之事实，以辅时及物为道。自为罪人，舍恐惧则闲无事，故聊复为之。”这是说，他一向看重的，是“辅时及物”，而不是为文；得罪之后，才“聊复为之”。这样的话，他不只说过一次。

还有，柳宗元年轻时，曾经“甚自尊大，颇慕古之大有为者”（《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》）。虽然仕途比较顺利，但他对于做官，却不甚积极。他说：“举甲乙，历科第，固为末而已矣。得之不加荣，丧之不加忧。苟成其名，于远大者何补焉？”他对做官的态度和韩愈是不同的。

柳宗元做官之后，对官场非常不满，置身于“大官”和“俗吏”之间，感到厌烦。（见《与杨海之第二书》）他的志愿是远大的，他是想“兴尧舜孔子之道”以“利安元元”（见《寄京兆许孟容书》），也就是想用先秦的儒家之道来做有利于平民百姓的事。他后来与王叔文等人从事朝政改革（即所谓“永贞革新”），就是要实现这样的政治

目的。

“永贞革新”失败之后，柳宗元被一贬再贬，处境十分困难。这时他开始反省自己，发现得祸之由，在于“抱拙”（见《乞巧文》）与“居愚”（见《愚溪对》）。为人既拙且愚，这样的人是不适于做官从政的。因为既拙且愚，贬官之后，也就一蹶不起。他不像韩愈，贬官之后，立即向皇帝认罪；他不仅不肯认罪，而且在贬官之后，还继续写成了《贞符》那篇“愚不可及”的文字。

既拙且愚，是柳宗元为人的一大特点。这样的人，一贬再贬，以致终身不返，并非偶然。

在长期被贬期间，柳宗元写了许多杂文。这些文章多半带有骚体气息，故后人谓之“变骚”或“续楚辞”。其中有些赋体之文如《瓶赋》、《牛赋》、《惩咎赋》、《囚山赋》等，都有不平之语、骚人之意。还有文体之赋如《乞巧文》、《骂尸虫文》、《斩曲几文》、《憎王孙文》以及《吊苌弘文》、《吊屈原文》、《吊乐毅文》等，多是有激而发、怨愤之辞。又有对问一类，如《愚溪对》、《天对》、《答问》、《起废答》等，亦多自我排遣、牢骚之言。

柳宗元文章最为世间传诵者，是《永州八记》，这些游记之文，也同样充满着迁客骚人的气息。不仅模山范水，而是借物写心，不同于一般游记之文。

再次是欧阳修的为人和为文。

就提倡古文而言，欧阳修之在宋代，有如韩愈之在唐代。欧阳修对于韩愈亦甚推重，但欧阳修之为人，与韩愈

不同。两人都是遇事敢言，也都一再被贬。但韩愈贬后“戚戚怨嗟”，而欧阳修则身居贬所，而处之泰然。他在《与尹师鲁书》中说：“每见前世有名人，当论事时，感激不避诛死，真若知义者；及到贬所，则戚戚怨嗟，有不堪之穷愁，形于文字。其心欢戚，不异庸人，虽韩文公不免此累。”“因此戒安道（余靖），勿作戚戚之文。”

不作戚戚之文，表现了欧阳修的个性特点。例如他写《醉翁亭记》，身在贬所，却大谈山水之乐。他在《答李太临学士书》中曾说：“修在滁三年，得博士杜君与处，甚乐。……今足下在滁，而事陈君与居，足下知道之明者，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。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，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；必与贤者共，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。”这里所谓“达于进退穷通之理”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对于“进退穷通”看得透彻，才能无累于心。真能无累于心，才能处之泰然，而不作戚戚之文。

因为“达于进退穷通之理”，欧阳修做官，也就难进易退。治平、熙宁年间，由于存有不同政见，欧阳修曾经多次申请致仕。曾有诗云：“貌先年老缘忧国，事与心违始乞身。”此诗是讲别人的，实亦呕吟自己。

因为“达于进退穷通之理”，欧阳修不仅不作戚戚之文，而且为文论事，也都写得自然平易。对于欧阳修的文章，苏洵曾有一段评论，他说：“执事之文，纤徐委备，往复百折，而条达舒畅，无所间断，气尽语极，急言竭论，而容与闲易，无艰难劳苦之态。”（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）这段话概括了欧阳修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。但何以有此

特点，苏洵言之有所未尽。

不仅苏洵之言有所未尽，后世称赞欧阳修之文者，也常是只见其外观，而遗其内涵。例如金、元之际，王恽挽刘祁诗云：“道从伊洛传心事，文擅韩欧振古风。”说“伊洛”之“道”与韩欧之文集于一人之身，至少是不曾懂得欧阳修其人其文的真正特点，因为欧阳修的思想与伊洛之道根本不同。至于明清两代的古文家，尤其是桐城派的作者，其称道欧阳修的文章，也大抵是取其“波澜意度”，而遗其精神实质。方苞之“学行继程朱之后，文章介韩欧之间”，其埋没欧阳修为文的真正特点，更不待言。

再次是曾巩的为人和为文。

世人说到曾巩，有时与欧阳修并称。这大概是从二人文风特点而言，因为曾巩之文也有“纤徐委备”的一面。明人何良俊说：“曾南丰文，严正质直，刊去枝叶，独存简古。故宋人之文，当称欧苏，又曰欧曾。”（《四友斋丛说》）但曾巩为人与欧阳修有所不同，他的文章也自有特征。

曾巩为人与欧阳修有相似者，主要在于“正直”，不依附权势。例如庆历年间，范仲淹被贬，欧阳修仗义直言：其后，范仲淹引荐他时，他却“同其退，不同其进”。曾巩也有类似的表现。当杜衍被黜之时，他却上书拜访，其《上杜相公书》有云：“今也过阁下之门，又当足下释衮冕而归，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。”不干名蹈利，不趋炎附势，这样的人品，是和欧阳修相似的。

但曾巩为人也有和欧阳修不同者。例如欧阳修对于现实政治颇多指责，指陈时弊，不遗余力。而曾巩不然，他虽然“在外十年，转走六郡”，对于民情吏隐，不应不知；但他对于时弊，很少言及。例如对于国家的“积贫积弱”，“冗兵冗费”，欧阳修曾反复言之；而曾巩在《请西北择将东南益兵札子》中，却不仅不讲“冗兵”，还大讲“宋兴，拨乱世，反之正。”再有，曾巩在《移范州过阙上殿札子》中，不仅不讲“积贫积弱”，反而大讲“生民以来，未有如大宋之隆。”这个看法也和欧阳修大不相同。也许正是因此之故，南宋叶适批评他“文与识皆未达于大通”（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五十）。

曾巩文章与欧阳修相似者，大都写得“纤徐委备”，自然平易。例如《上欧蔡书》，讲自己读书、处世的经过，就有从容不迫的特色。但曾巩为文独特的风格，是比欧阳修醇厚而温雅。尤其是他的几篇论学之文，如《战国策目录序》、《南齐书目录序》等，书生之见，学者之气，都很明显。而且，其中所讲“是非得失，兴坏理乱”云云，俨然是后世醇儒之言。也许正是因此之故，曾巩之文，曾经受到清代桐城派的称道。这样的文章，也比较符合大清王朝的政治需要。

再次是王安石的为人和为文。

王安石早年曾是曾巩的好友，曾巩对于他的为人，十分称赞，曾向欧阳修一再推荐，其《再与欧阳舍人书》云：“巩之友有王安石者，文甚古，行称其文。”既称其文，又

称其行，由此已可略见王安石为人为文颇不平凡的特征。王安石有《与孙正之书》，其中称孙正之“行古之道，又善为古文，”“能以韩、孟之心为心。”这话虽是称孙正之，实际上也是“夫子自道”，正与他自己的文行一致。他在此书中还说：“时乎杨、墨，已不然者，孟轲氏而已；时乎释老，已不然者，韩愈氏而已。”其称赞孟轲和韩愈，都是因为他们敢于不同于时尚，而有所“不然”。

王安石在熙宁年间，推行新法，力排众议，独行己见，就表现了他为人的这一特点。发而为文，也就有要言不繁、没有枝叶的特点。

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他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司马光致书王安石，全文四千餘言。而王安石的答书则甚为简短。其言曰：“今君实所以见教者，以为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也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；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辟邪说，难任人，不为拒谏。至于怨诽之多，则固前知其如此也。”对于王安石这样的文章，前人曾有评论，刘熙载《艺概·文概》曾引谢叠山之言，谓之“笔力简而健”。说他“只下一二语，便可扫却他人无数大段”。

但王安石为文尚简，也曾受过讥评。朱熹就曾认为“荆公文阔”。（《朱子语类·论文》）王士禛甚至认为其文之简，与其“人品心术”有关，他说“王介甫狼戾之性，见于其诗文，可望而知。……《平甫墓志》通首无兄弟字，亦无一天性之语，叙述漏略，仅四百餘字。虽曰文体谨严，

而人品心术可知。”（《香祖笔记》卷十二）这个批评是错误的，事实上，王安石写作墓志，行文之简，是一贯的。蔡上翔在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中所谓“言甚简而其痛弥深”云云，是说得中肯的。

当然，王安石的文章特点在“简”，但他也有长篇大论，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一文，长达万言，似乎不“简”。不过，此文虽长，却无枝蔓。就其用语而言，仍不失为“简”。

再次是苏洵的为人和为文。

苏洵自称“少不喜学，生二十五岁，始知读书”（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）。年三十七，始应制举，不第。此后不再应试。后因欧阳修推荐，朝廷命他进京应试，他又推辞。为人如此，其不得第，是自然的。

苏洵虽不得第，却很自负，著书为文，自比古人。他在《上韩枢密书》中说：“洵著书无他长，及言兵事，论古今形势，至自比贾谊。所献《权书》，虽古人以往成败之迹，苟深晓其义，施之于今，无所不可。”又在《上皇帝书》中说：“曩臣所著二十篇，略言当世之要，陛下虽以此召臣，然臣观朝廷之意，特以其文采词致有可嘉，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。天下无事，臣每每狂言，以迂阔为世笑；然臣以为必将有时而不迂阔也。”对大臣、对天子如此放言自夸，这是十分自负的表现。对于苏洵的自负之文，有人称赞，有人不以为然，例如叶适曾说：“苏洵自比贾谊，曾巩、王安石皆畏其笔，至以为过之。……《权

书》、《衡论》多谈兵，草野未除，去讐固远。”

苏洵为人如此自负，发为文章，也就无所忌惮，具有恣肆不羁的特点。例如《衡论·论相》一文，讲天子和宰相的关系，认为古时天子甚尊宰相，近世则天子太尊而宰相太卑。他说天子应把宰相看作“腹心之臣”，“尊之如父师，爱之如兄弟”。要作到“百人誉之不加密，百人毁之不加疏”。任用宰相，不仅要“尊其爵，厚其禄”，而且要“重其权”。苏洵这些言论，实质上是为宰相争权。这样的言论，在宋代，是有代表性的，王禹偁、欧阳修都曾有类似的观点。这是宋代文人干预朝政的一种思想倾向。由于宋代政治比较开明，所以苏洵敢发此言。如果是在明代，这样的话是不能讲的。朱元璋杀了宰相胡惟庸之后，曾经干脆不设宰相。连宰相之位都要撤掉，更不要说“尊其爵、厚其禄”以及“重其权”了。由此看来，苏洵文章之有这一特点，也和时代有关。

再次是苏轼的为人和为文。

苏轼为人的一个主要特点，是待人接物，比较随便，而且“不节语言”。他曾说：“余性不节语言，与人无亲疏，辄输写肺腑，有所不尽，如茹物不下，必吐出乃已。”（《密州倅厅题名记》）又说：“余，天下之无思虑者也，遇事则发，不暇思也。未发而思之则未及，已发而思之则无及。以此终身不知所思。言发于心而冲余口，吐之则逆人，茹之则逆余；以为宁逆人也，故卒吐之。”（《思堂记》）有这样一吐为快的性格，为文也就有真实、明快、直抒胸臆、

一泻无餘的特色。

苏轼在《文说》中也曾讲到自己为文的这一特色，他说：“吾文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而出，于平地滔滔汨汨，虽一日千里无难。及其与山石曲折，随物赋形，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，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，如是而已矣。”从苏轼的创作实际考察，他的文章确实如此。还有，苏轼不仅这样自言其文，也曾这样称赞他人之文。例如他在《答谢民师书》中说：“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，观之熟矣，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。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。”这里说的“行云流水”，“行于所当行”，“止于所不可不止”云云，与《文说》之言，大抵一致。谢民师的文章未必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而苏轼发为此论，也有“夫子自道”的意思。

苏轼文章的这一特色，在其议论诸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。叶适论述历代的“论事之文”时，曾经认为：“春秋时，管仲、晏子、子产、叔向、左氏善为论，汉时贾谊、司马迁、刘向、扬雄、班固善为论，后千餘年，无有及者。虽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间起，不能仿佛也。”他认为能者只有苏轼。他说：“独苏轼用一语，立一意，架虚行危，纵横倏忽，数千百言，读者皆如其所欲出，推者莫知其所自来。虽理有未精，而词之所至，莫或过焉。盖古今论议之杰也。”（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五十）叶适在这里所说的“纵横倏忽”，“莫知其所自来”，也是苏轼《文说》所谓“不择地而出”、“而不可知”的意思。

苏轼文章这一特色，主要来自他那自由不羁的性格。